

郑谷与晚唐诗风

赵敏 崔霞著

鄭

谷

江西高校出版社

郑谷与晚唐诗风

郑谷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谷与晚唐诗风\赵敏 崔霞著 -南昌市:

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49301362

郑谷与晚唐诗风

赵敏 崔霞著

丛书名: 江右名家研究丛书

ISBN: 9787549301362

定价: ¥ 25.00

平装: 262页

内容简介: 《郑谷与晚唐诗风》共分10章,内容包括:
晚唐与晚唐诗风、郑谷及其家世、郑谷生平
综述、郑谷诗歌的分期与特点等。本文力图
从郑谷的具体作品入手,联系晚唐特定的文
化背景,重点探讨郑谷诗歌的创作历程、艺
术风貌及与晚唐三大诗风的关系等问题,以
期较为全面地展现其诗的独特风格,进而对
其作出恰当的评价。

引 言

我们在讨论唐诗时，往往按照时间的先后将其分为初、盛、中、晚几个阶段，这种分法，是以史学观念观照文学的结果。唐代的政治史大抵经历了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唐代文学虽然与之不完全同步，但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总体特征的起伏变化。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这种按照政治史的变换来把握文学发展史的方法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当然我们也应对此加以警醒，这种求同法是以牺牲大量的个性作为代价的，而文学的生命恰恰在于个性之中。这种危险其实已为多数人所意识到，康熙在给彭定求等人编次的《全唐诗》作序中便极有见地地说“而论次唐人之诗者，辄执初、盛、中、晚，岐分疆陌，而抑扬轩轻之过甚。此皆后人强为之名，非通论也。”西方学者试图以“小历史”替代“大历史”的努力也是类似的表现，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些努力也只是徒劳，一旦沾上一个“史”字，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历史性的宏观叙事，尽管我们努力想诠释现象、揭示真相，却依然难免掺杂大量的主观选择、臆断和解释，于是最终我们读到的是荷马的《史诗》，是司马迁的《史记》，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某某的“文学史”，但“真相”到底如何？又是否真的有所谓的“真相”呢？

“晚唐诗风”也是文学史的问题，讨论此问题意味着我们需要

从数百家性格各异的诗人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来，其难度、偏差可想而知。

虽然面对风险，我们却依然要在这条路上找寻，无它，因为目前没有更好的方式。要让文学以“活着的姿态”存在，就只有接受这种风险。我们无法让几千年的文学遗产都为读者所阅读、所鉴赏，只能在一定的文学观念、价值观念的左右下去挑选一些作家、作品让大家熟悉、接受。即便揭示的也许真的是冰山一角，总聊胜于无吧。另外，文学发展似乎也确实有一些规律可循，比如她确实是社会现实的反映、确实与意识形态相关、确实会受制于“外部权威”^①——文学传统等等。中国文学又有些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源于民族对于传统的执迷，源于强烈的传承和道统意识，而其表现则在于她总是积极自觉地与“外部权威”相契合。因此，《诗三百》成了文学创作的典范，占据了艺术与道德的双重高度，成了永远也无法逾越的巅峰。相对于西方文学，我们的文学在创新方面显得不足，在继承方面太过富余。于是中国文学确乎有了追本溯源的可能，钟嵘的《诗品》、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吕居仁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以及宋代开始兴起的诸多诗话大多是这种追本溯源、顺藤摸瓜的产物。这种顺藤摸瓜的门径不断覆盖、加强着传统，成了学习者的不二法门。清人吴乔说得好：“人于诗文，宁无乳母？脱得携抱，便成一人……谁人少时无乳母耶？”^②虽然最终未必人人都脱得了携抱，但推崇文官制度的这些朝代还是造就了辉煌的诗歌成就。而最终，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讨论中国文学，讨论晚唐诗风。

① [英]艾略特《批评的功能》。

② 吴乔《答万季野诗问》。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章 晚唐与晚唐诗风

第一节 “晚唐”一词	(1)
第二节 “晚唐”的范围	(3)
第三节 晚唐社会	(7)
第四节 晚唐诗风	(9)
第五节 晚唐诗派	(12)

第二章 郑谷及其家世

第一节 郑谷生卒年考	(22)
第二节 郑谷家世	(28)
第三节 对于郑谷的研究	(35)

第三章 郑谷生平综述

第一节 少年郑谷	(37)
第二节 科场十六年	(45)
第三节 为官与归隐	(53)

第四章 郑谷诗歌的分期与特点

- 第一节 郑谷诗歌创作分期 (63)
- 第二节 郑谷诗歌特点 (73)

第五章 郑谷诗歌分类

- 第一节 写景咏物诗 (83)
- 第二节 感时伤事诗 (96)
- 第三节 寄献酬赠诗 (104)

第六章 郑谷诗风辨析

- 第一节 郑谷诗坛爱惹僧 (113)
- 第二节 郑谷“格卑”辨 (125)

第七章 郑谷交游小考

第八章 咸通十哲

- 第一节 咸通十哲 (162)
- 第二节 “十哲”其人其诗 (165)
- 第三节 薛能、李频与“十哲” (176)
- 第四节 “十哲”诗风总述 (178)
- 第五节 “十哲”的典型意义 (181)

第九章 郑谷与晚唐诗人

第一节 郑谷与李朋、马戴	(188)
第二节 郑谷与李频	(196)
第三节 郑谷与薛能	(202)
第四节 郑谷与司空图	(214)
第五节 郑谷与齐己	(221)

第十章 郑谷与晚唐诗风

第一节 郑谷与姚贾诗风	(232)
第二节 郑谷与元白诗风	(242)
第三节 郑谷与温李诗风	(251)

后 记	(261)
-----------	--------

第一章 晚唐与晚唐诗风

对于晚唐诗风的总结与批评,从唐末就已经开始,此后在宋、元、明、清等时期,“晚唐诗风”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我们打算在这一章中做一点追本溯源的梳理工作,以清晰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节 “晚唐”一词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晚唐”一词当产生于宋代。宋祁写于皇祐二年(1050)的《宋府君墓志铭》中就使用了“晚唐”二字:“余四世祖在晚唐时以御史中丞失官”,开了后人之先河。不过,此处“晚唐”是用在政治史中,而非用在文学史中,文学史中使用这一语词还要稍晚一些。

在“晚唐”一词普遍用于文学史之前,“唐末”一词是其替代品,如“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①、“江左齐梁,竞争一韵一字之奇巧,不出月露风云之形状,至唐末则益多小巧,甚至于近

^① 欧阳修《六一诗话》。

鄙俚”^①、“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②等等。但与“晚唐”一词相比，“唐末”的局限非常明显，它指涉的时间太短。唐代三百年的时间，“唐末”只能包括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若是用来对文学史进行分期，则可能因为时间太短而带来不便。陈振孙大约就注意到了这种区别，因此其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有这么一段话“图(司空图)见《卓行传》，唐末高人胜士也，蜀本但有杂著，无诗。自有诗十卷，别行。诗格尤非晚唐诸子所可望也。”陈氏介绍司空图的时候用“唐末”一词，而将其诗风进行比较时用“晚唐”一词，便是因为“晚唐”所指涉的时间更为宽泛，外延更为广大，我们可以说姚合、贾岛是“晚唐”人，却不能说他们是“唐末”人。另外，“唐末”需要“唐初”“唐盛”“唐中”来与之对应，“唐盛”“唐中”并不符合语言习惯。所以若是从文学史分期的角度来看，“唐末”一词显然是不能胜任的。

《六一诗话》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表达方式“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比之“唐末”一词，“唐之晚年”显然进了一大步，其内涵、外延均与“晚唐”一致，也可以用来对唐代文学进行分期。但这一术语有一个不便，即它稍嫌冗长，不符合精练原则和口语习惯，所以它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透过“唐之晚年”这种拟人化的比喻，我们可以窥见彼时关于唐诗分期的思想正在走向成熟。因为有“晚年”，必然也就需要有“初年”“中年”等与之对应。

果然，不久，“晚唐”一词开始普遍出现在文学批评之中。吕南公说“余年二十三始读昌黎文，又明年亦读少陵诗矣。……异时更读孟东野、王摩诘、张文昌、李太白等，乃至泛读沈、宋以来至于晚唐诗人集本焉。”^③苏轼说“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

① 包恢《书侯体仁存拙稿后》，《弊帚稿略》卷5。

②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苏轼文集》卷69。

③ 吕南公《韦苏州集序》，《灌园集》卷7。

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①黄庭坚说“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反类鸩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②沈括说“晚唐人士，专以小诗著名，而读者灭裂。”^③蔡居厚说“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④吴可说“晚唐诗失之太巧，只务外华而气弱格卑，流为词体耳。”^⑤

“晚唐”一词的使用，是宋人对唐代诗风整体观照、把握的体现和结果。从苏轼、沈括、蔡居厚、吴可等人的总括性言语可以看出，他们对晚唐诗风的特点已经相当熟悉。这种熟悉不是孤立的，而是建立在对整个唐代诗风总体把握的基础上的，因为若没有对唐诗的总体理解，是不可能指出晚唐诗风与唐代其他阶段诗风之差异的。

第二节 “晚唐”的范围

虽然北宋诸人已经熟悉了唐诗各阶段的特点，但他们并未对各阶段进行时间界定。及至南宋后，“晚唐”所指涉的时间范围才逐渐清晰起来：

陆游认为“晚唐”当指宣宗大中(847)以后“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枯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

① 苏轼《书荆公暮年诗》，《苏轼文集·佚文汇编》卷5。

② 黄庭坚《与赵伯充贴》，《山谷集·外集》卷10。

③ 沈括《梦溪笔谈》卷14。

④ 蔡居厚《诗史》。

⑤ 吴可《藏海诗话》。

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不逮；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①

姚镛则将“晚唐”限于僖宗咸通(860)以后：“诗盛于唐，极盛于开元、天宝间，昭、僖以后，则气索矣。”^②

严羽认为“元和诗”之后皆为“晚唐诗”：“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开元、天宝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③因此他所认为的“晚唐”，约自文宗大和(827)以后。

俞文豹的意见大约与严羽类似：“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清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④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等人被俞文豹纳入“中叶之全盛”的范围，则“元白”之后，即是“晚唐”了。

方回所界定的“晚唐”跨度甚长：“予选诗以老杜为主，同时人皆盛唐之作，亦皆取之。中唐则大历以后、元和以前，亦多取之。晚唐诸人，贾岛别开一派，姚合继之，沿而下亦非无作者，亦不容不取之。”^⑤他将元和元年(806)之诗也算入了“晚唐”的范围了。

此后的元人对于“晚唐”的认识，多源自于宋人，无出其右，兼以语多琐碎，故略而不论。而关于“晚唐”之范围，我们还必须说明代高棅、胡震亨二人的观点：

① 陆游《跋花间集》，《渭南文集》卷30。

② 姚镛《题戴石屏诗卷后》，《雪蓬稿》。

③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④ 俞文豹《吹剑录》。

⑤ 方回《瀛奎律髓》卷10。

高棅在其《唐诗品汇》中清晰地表达了看法,认为元和以后(约827)为“晚唐”:“唐诗之变渐矣。隋氏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大历、贞元之诗是也;四变而为晚唐,元和以后之诗是也。”

胡震亨也表达了与高棅类似的看法“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至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一变也;高、岑、王、李,风格大备,又一变也;杜陵雄深浩荡、超忽纵横,又一变也;钱、刘稍加流畅,降为中唐,又一变也;大历十才子中唐体备,又一变也;乐天才具泛澜,梦得骨力豪劲,在中晚间自为一格,又一变也;张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实,渐入晚唐,又一变也。嗣后温、李之竞事组织……郑都官、杜荀鹤之不避俚俗,变又难可悉纪,律体愈趋愈下,而唐祚亦告讫矣。”^①

学术界一般接受高棅、胡震亨对于唐诗的分期,实际上也就接受了他们对于“晚唐”的时间界定。现行的各种文学史一般也认同“从文宗太和、开成之后到唐亡的七八十年,文学史上一般称为晚唐时期”^②的看法,原因是“中唐诗歌高潮到唐穆宗长庆时期逐渐低落。长庆以后,唐王朝危机进一步加深,士人心态发生巨大变化。诗歌适应时代变迁,有了新的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于是唐诗风貌再次出现明显转变,由中唐进入晚唐。”^③

虽然唐代文学因为“唐诗风貌再次出现明显转变”而进入了“晚唐”,但“晚唐”诗(晚唐文学也是如此)还是明显地呈现为前后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是宣宗大中年间。晚唐诗从文宗

①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10。

②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二)。

③ 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二)。

大和(827)^①至宣宗大中(847)年间实际上是唐诗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从作者上来说,即使不算早亡的元稹(831年卒)、张籍(约830年卒)、王建(约830年卒),也还有刘禹锡(842年卒)、贾岛(843年卒)、白居易(846年卒)、李绅(846年卒)、杜牧(852年卒)、许浑(854年卒)、张祜(854年卒)、姚合(855年卒)、李商隐(858年卒)等名家巨匠璀璨其间;而大中之后,名家凋零,虽有薛能、郑谷、司空图、韩偓、吴融、聂夷中、杜荀鹤、皮日休等人活跃其间,但已无法和前期同日而语。从诗歌来看,前期作家诗歌“多侧重于表现个人矛盾的内心世界……常常深含着一种忧愤、感伤的情绪。在艺术上,诗人们多学杜、韩、李,但又各具有鲜明的创新精神……因而促使唐诗的艺术又得到了新的发展。”^②而后期诗歌则“弥漫着一股消沉、悲观的末世情绪……在艺术上,这时期的作者,大都是中唐后期以来诸名家的学步者……所以,这个时期的诗人虽多,诗歌艺术却没有得到什么发展。”^③

郑谷生于宣宗大中四年(850),活跃于诗坛则主要在咸通以后,因此我们讨论郑谷与晚唐诗风的时候更多地要把重点放在晚唐后期。实际上,就本书而言,我们或许更应该采用陆游、姚镛等人对“晚唐”的划分方法,但考虑到高棅等人关于晚唐的分法已经为大家所熟悉,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坚持,下文在具体论述的时候有所侧重就是了。

①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晚唐是从敬宗宝历时开始,如吴庚舜、董乃斌的《唐代文学史》(下),但宝历与大和只差三年,这三年在唐诗分期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故本书将此两种分法视为一种观点。

② 乔象钟、陈铁民《唐代文学史》(上)。

③ 乔象钟、陈铁民《唐代文学史》(上)。

第三节 晚唐社会

总体而言,文学就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虽然这反映也可以通过寓言、抒情、魔幻等非写实的方式来进行,但终究根植于现实。而晚唐文学之所以失却了盛、中唐诗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热情而呈现出一种末世的衰飒,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晚唐的社会现实。

晚唐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经济衰微、民不聊生,“于斯之时,阉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间。”^①李商隐曾经这样记录晚唐农村的生存境况“高田长槲枿,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②内中之凄惨较杜甫“三吏”“三别”以及《兵车行》等诗中所反映的境况又要超过许多。

从统治集团内部来看,晚唐的问题主要有三大症结:宦官专权、党争、藩镇割据。

唐代中后期由宦官掌神策军和担任枢密,宦官权重一时,为祸巨大,《旧唐书·宦官列传》载“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骑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清人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唐代宦官之祸》中又说“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僖宗纪赞谓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可见当时宦官专权的程度让人咋舌。宦官专政是晚唐社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4。

② 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李义山诗集》卷下。

会政治动荡、经济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文官集团作为诗歌创作的主体，也陷入了与宦官的争斗之中。其最为惨烈的结果，就是发生在大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朝野为之一空。而终唐一世，“南衙北司”争斗不断，这种争斗在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的同时，也给文人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藩镇是导致唐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藩镇之祸，肇始于安史之乱，其后经宪宗平淮西及德宗“会昌伐叛”，情况有所控制。不过自僖宗乾符后，藩镇势力越发强大，这些藩镇“五侯九伯，无非问鼎之徒；四岳十连，皆蓄无君之迹”^①，个个心怀鬼胎，与“南衙北司”相互勾结，最终导致唐亡。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唐节度使之祸》中说“天子力不能制，则含羞忍耻，因而抚之，姑息愈甚，方镇愈骄。其始为朝廷患者，只河朔三镇，其后淄、青、淮、蔡，无不据地倔强，甚至同华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泽潞亦连畿甸。而卢从史、刘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

党争也是困扰中晚唐君主的一个问题，文宗曾经发出过“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②的感叹。党争主要发生在晚唐前期，最终以李德裕的贬死崖州而结束。其中李宗闵、牛僧孺、杨虞卿、杨汉公、杨汝士、张元夫、萧瀚等人一派，基本上是科举出身的庶族；李德裕、李绅、元稹、郑覃等人为一派，大多出身贵族，他们的争斗史称“牛李党争”。“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③文人集团内部的斗争，极大地削弱了朝臣的力量。而在争斗中，他们又与宦官、藩镇等相互利用、依靠、勾结，客观上也对宦官横行、藩镇跋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士人的报国热情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宋范祖禹评论唐末党争时说“唐之朋党，始

① 刘昫《旧唐书·哀帝本纪》。

② 欧阳修《新唐书·李宗闵列传》。

③ 《资治通鉴》卷241。

于牛僧孺、李宗闵对策，而成于钱徽之贬。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群臣有党由，主听不明，君子小人，杂进于朝，不分邪正忠谗以黜陟之，而听其自相倾轧，以养成之也。是以穆宗以后，权移于下。士朝无公政，士无公论。爵赏僭滥，刑罚交纷。士之附名者，不入于牛，则入于李。不忧国家之不治，而唯恐其党之不进也。……故其衰季，士无操行，不足称也。”^①

宦官、藩镇、党争等问题勾连在一起，致使唐政府一直无法有效地控制局面，加之官吏的腐败、无能，唐王朝便江河日下，气息奄奄，最终为后梁所代替。

第四节 晚唐诗风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②与晚唐时政相应，晚唐诗风与盛、中唐相比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们的作品，不仅没有盛唐时代那种自由奔放的朝气，也没有元和时代那种满怀激烈的勇气。他们不是不关心社会政治，但这种关心总是伴随着失望；他们常常表示旷达，而这种旷达却和无奈相联。”^③明人冯时可因此评论道“初、盛唐之诗真情多而巧思寡，神足气完而色泽不屑屑也；晚唐意工词纤，气力弥复不振矣。春鸟秋蛩，节变音迁，人乘代运，孰能知其然哉！”^④同为明人的陆时雍也说“中晚唐声格相成，第晚唐日趋杪削，入后一段。颓落俚恶，不成声调，诗道、国

① 范祖禹《唐鉴》卷19。

② 《礼记·乐记》。

③ 骆玉明、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中)。

④ 冯时可《雨航杂录》卷上。